

導論

本書包含九個章節，分別檢視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面向。啟動我撰寫這本書的時機是陳水扁總統的第二任期，尤其是2006年的紅潮運動。當時的台灣學術界曾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評論整個事件：被稱為715學者群的評論者認為，陳水扁政府帶給台灣民主與認同政治的是一個信任與道德的危機；¹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則在社論裡確認他們幾年前的先知式警告，亦即解嚴後的新本土政權早已發展成不顧原則只知近利的沙文力量。²這些不管帶點哀傷或嘲弄式的批評都使得我們無可避免得面對一個問題：到底過去廿五年的台灣民主代表的意義何在？剎那間，個人操守問題意外地將民主置於天平上加以審判。

2000年當陳水扁進入總統府時，他的新政府就被視為此一新興民主的試金石，因此扁政府的失敗，也逼使我們得重新檢視多年來的民主生活。當然民主一詞並非解嚴後才被使用，漫長的戒嚴時期，當時的總統蔣介石都曾經發誓要追求民主，蔣經國也說他會堅守民主陣容。雖然

¹ 聲明在當年7月15日發表，參與聯署者包括了許多活躍的政治與社會評論學者，例如吳乃德、李丁讚、黃長玲與林國明等。

² 刊登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2期，也參考趙剛（2006）。

戒嚴體制讓這樣的宣稱有點可笑，不過威權的國民黨統治的確也在台灣造就了一個有限度的選舉政治體系。

這本書的完成則是在馬英九總統的第二任期，歷經五都和連任選舉的馬英九基本上底定其政治版圖。馬英九2008年為國民黨取回政權，對很多人來說，代表保守力量的返回。然而檢視他的行事與論說，弔詭的是，這個新保守勢力卻是奠基於一個形成中的「民主共識」。這樣的評價或許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但是「我們都是民主人士」這句話在2008年後不再只是誇大的空話，也不再只是一些人的專利；除了堅守民主陣容的蔣經國、黨外到民進黨創黨時代拋頭顱灑熱血的反抗鬥士、民主先生李登輝或是促成第一次政黨輪替的台灣之子陳水扁，最新加入隊伍的成員則是反貪腐的紅潮抗議者和收割這個力量的馬英九。2008年後，百分百的「民主台灣」真正誕生，不同立場的行動者皆宣稱自己對民主的貢獻，皆有自己的爭民主事蹟可以述說流傳(參考 Brown 2011)。

解嚴後廿五年，台灣人逐漸將國會定期改選、總統普選、地方自治、法治與司法獨立視為理所當然或必得追求的目標，雖然代議民主體系有其諸多系統性和實務運作上的缺點，但已經成為全民共識。然而，這樣的民主共識代表甚麼意義呢？這個民主共識不只牽涉到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的變遷，民主化作為一個曲折的知性與情感的建構過程，同時測試著不同日常脈絡裡的認知極限：跟隨這個體系而來的許多措施和想法左右每天的做人做事。轉化中的世界觀與感知結構持續改變日常生活，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創造與活力，揉雜了原本的在地觀點，也反過來介入一般人認識世界的方式。

換句話說，藏於民主共識底下的是個人或團體在各個情境狀況中的創造性建構與批評性衡量。正是對這些個別建構與衡量的興趣，激起了我想要理解當代社會運動與文化發展的急迫心情。本書著力研究民主的日常實踐，試圖見證那些生活與工作其間的個人如何回應與評價民主時代。在這些日常生活裡，民主被分析，被表達；民主生活因此是在持續轉變的價值與意義軸線裡，個人或團體自我探索、實現與評價

的過程。假如威權政治代表的是遺忘與欺騙，民主作為它的私生子（相對於法統）不只是有關記憶，這個記憶過程還必須全力抗拒再一次以簡單統一口徑的方式為之。

因此 Samuel Huntington (1991) 所說的第三波民主，也許從來沒有走到鞏固或崩潰的十字路口，測試這個民主社會是否有決心捍衛其核心價值。我們寧願將世紀之交的民主化視為某種發生在錯誤地方與錯誤時間的政治工程，尤其這個源自西方的概念及其許多基本價值已受到各方的攻擊與抗拒，甚至被認為已經過時。這些挑戰包括古典的社會主義或者較新穎的後馬克思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後現代主義對福利國家的放棄，或者較晚進的全球主義對民族國家的無情攻擊。

這個時空錯置的似曾相識感，使得民主化一開始就無法是抽象概念強加的過程，二十世紀末開始的民主化，其實是一個跨域的思想流動/行動實踐的場域，試圖扳動這個「錯誤」工程，以及由此產生的連動效應。因此，本書將仔細耙梳民主化作為個人或群體長期的智識探索與行動實踐，並特別檢視日常脈絡與組織過程中，這些探索與實踐持續遭遇的衝突與矛盾，以及可能的變異與轉化。

民主在台灣

前面提及，陳水扁到馬英九的總統任期已經消磨掉所有對民主的樂觀看法，民主生活成為自我質疑的時刻。當期待的心情消退，代之而起的是抑鬱寡歡，不像前一個世代壓抑的悲情，抑鬱帶來的是毫無來由的無力感。如果陳水扁的八年是熱情與失望交錯的不知所措，馬英九上台之後則是緬懷政治的起始。過去成為現狀的逃避空間，現在則是某個光榮過去的不幸後果。國民黨咒罵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的所謂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民進黨則自憐地以為過去幾十年只有他們在為民主打拚，別人則都是反動力量。兩方都耽溺二十多年前那個簡單的邏輯，國民黨帶來經濟繁榮，而民進黨則是反威權的先鋒進步力量。

這個緬懷的政治起因於台灣兩大政治勢力都不願正視現實，使得從經濟到社會福利，從兩岸關係到國家認同等問題，都無法得到一個具體持平的看待。這個現實牽涉的是：台灣從解嚴到現在的廿五年間，到底在政治、文化與社會的不同領域都起了甚麼樣的變化。政黨組織跟公民團體在新的政治文化下如何轉型與調適？弱勢人群的現身與發聲如何顯示民主生活的有限？經濟、福利與環保又在甚麼樣的社會願景下受調節？在地怎麼認識自己，跨國又如何連結他方，以對抗全球化的同質力量？

為了抗拒這些政治的失語症，本書透過Julia Paley所謂「民主人類學」，以檢視民主的「在地意義、流通論述、多重爭議和轉變的權力形式」(Paley 2002: 469)。Paley的*Marketing Democracy* (2001)一書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案例，讓我們可以從社會運動者的眼光看待民主，她檢視了南美洲智利的衛生福利團體，以了解民主可以有的多重發展途徑，社會運動被視為是新的治理方式下的啟動者。這呼應其他有關抗爭和反抗的人類學的民族誌研究，關注政治轉化的日常細節和抗議的微觀過程(Ginsburg 1989; Abelman 1996; Stephen 1997; Edelman 1999; Starn 1999; Nash 2005; Escobar 2008)，豐富了民主人類學的內涵(參考Holland et al. 2007; Paley 2008)。

社會、歷史與政治學家也注意到社會運動和民主發展的關連。文化史學者Michael Denning (2004)認為民主的當代用法事實上從十八世紀開始的社會運動裡獲得意義，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 (2007)的書也指出相同的觀點，探討公共政治參與對民主化的貢獻。政治科學家Robert Dahl則認為歐洲十八世紀再生的民主透過當時剛創造的許多地方集會加以具體化，因此「自由人可以參與治理」(Dahl 1998: 22)。最近歐陸批判學者對民主的反省性探討，則重新指出實際存在的民主的危險，以及更多樣的基進民主形式的可能(Rancière 2006; Mouffe 2009; Agamben et al. 2011)。

1990年代初期以來的台灣研究也注意到自由參與的公共生活對後

威權台灣民主的影響。在北美出版的三本著作代表這一股新研究潮流 (Cheng & Haggard 1993; Harrell & Huang 1993; Rubinstein 1993)，關注這個嶄新的台灣。其中，Rubinstein 編纂的 *The Other Taiwan* 開啟另類的分析台灣的視角，將台灣視為是不同的團體、組織、族群都試圖出聲的地方，以面對轉變中的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狀況 (Rubinstein 1993: 3)。社會學家蕭新煌、張茂桂、徐正光和署名機器戰警的作品 (Hsiao 1990; 徐正光 1991; 張茂桂 1994; 機器戰警 1994) 則代表 1990 年代初期的本土視角，將社會運動和文化抗爭的爭議性政治抬高成民主化的定義時刻 (也參考徐正光、宋文里 1989)。

後來許多研究更著力於分析和這些先行研究相關的特定議題，包括國家認同 (Wachmann 1994; 若林正丈 1994; Makeham & Hsiao 2005)、學生運動 (Wright 2001)、性/別 (劉毓秀 1997; 何春蕤 1997; Farris, Lee, & Rubinstein 2004)、環境保護 (何明修 2006)、社會福利 (蕭新煌, 林國明 2000; Wong 2007)、階級分化 (劉華真 2008)、族群想像 (施正鋒 1997; 孫大川 2000; 王甫昌 2003; 張維安等 2008) 和地方政治 (王金壽 1997, 2004; 呂欣怡 2002; 容邵武 2004; 吳介民, 李丁讚 2005; 莊雅仲 2005a, 2005b, 2011; Jung 2012)。這些多樣的成果刺激了持續研究台灣民主的興趣，創造審視台灣政治多重且深度意義的思考空間 (Wang & Rojas 2007; Copper 2010; 何明修, 林秀幸 2010; Ash, Garver, & Prime 2011; Rigger 2011; Chang & Kloter 2012; Fell 2012)。

李丁讚 (2004)、何明修 (2006)、Robert Weller (2006) 和 Richard Madsen (2007) 的作品對本書標榜的民主的民族誌研究特別有啟發性，他們都企圖挑戰和更新市民社會在台灣之意義。李丁讚強調公共領域怎麼樣建基在一個談情論理的市民社會，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地方網絡裡的情感聯繫和公共論壇形成的關聯性 (李丁讚 2004)；何明修的書 (2006) 則倡議台灣的政治民主必須處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任何解決方案都得深入了解複雜的市民社會。同樣企圖批判西方的市民社會觀念，Weller (1999, 2006) 檢視轉變中的社群生活以及不同形式的民間

連帶，尤其關注地域性在台灣政治發展裡的作用。Madsen則研究台灣的當代佛教組織，他反對一般西方研究裡對宗教團體的懷疑主義，反過來倡議進步的宗教社團的可能，認為慈濟、佛光山和法鼓山等台灣的宗教組織，事實上顯現了一個開放形式的意識轉化過程，因此協助創立了一個自由的世界秩序，成為「民主之法」(Madsen 2007: 151；也參考Huang 2009)。

最後，許多新興文化現象常在本書談的民主化過程產生爆炸性的爭議。酷兒(queer)和性學研究在中央大學的發展，就和原來本土的性別研究產生衝突，尤其在性工作是否合法化的議題上，彼此相爭已久(林芳玫 1998；Ding 2000；Huang 2011)；或者移民議題顯現出來的民主的虛偽性與種族主義，夏曉鵬(2002)和藍佩嘉(2006)的書說明了跨國性族群地景下的一個例外世界如何形成、運作和被抗拒。吳德容和王宏仁(Ngo & Wang 2011)的書展示了晚近的社會學如何介入理解這些文化差異與承認的政治，這也是本書的一個關懷焦點。

本書架構

本書探討後威權時代台灣的民主發展，提供從思想和實踐雙管齊下檢視台灣民主的機會。如前所述，民主實踐在台灣從來不是線性的進步主義，每一階段都無法避免出現矛盾。相對於政治自由，大家感到經濟與社會自由的闕如；民主與現代化曾被視為一體，現在大家則嘗到放縱式自由經濟的苦果。

這些充斥於生活的猶豫與懷疑，使得我們注意民主所帶來的一些基本概念及其效應。本書探討三類關鍵概念：分別是公共、本土與地方問題。第一部分關注公共性問題，基本上檢視國家和市民社會辯證性的轉化過程中，新的公共空間如何形成。首先，我探討國家自從1980年代以來遭遇的問題，在台灣立場相左的許多人(統獨、左右)，卻一致同意後解嚴的政治轉化基本是一個國家重新打造的過程。這牽

涉到主權概念，雖然主權一詞在中文出現是相當晚近的事，但這個詞在許多有關台灣政治的場合卻相當敏感。古典的政治理論將主權定義成以權威的方式代表某個政治社群作為的正當基礎，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將這個權威行使至少在理論上屬於人民，因此革命性地創造了一個人民意志的代表體系(Held 1996)。在台灣戰後歷史上，這個影響超過一世紀以上的自由民主哲學，卻成為當政者不可承受的負擔。退敗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必須一方面創造它仍擁有全中國主權的神話；另一方面，國民黨強調其屬於民主陣營的宣稱，則必須解釋它的權力如何來自人民授權，因此一個憲政民主可以在台灣實施。

這兩項任務其實都不單純，因此早在後現代學者開始挑戰主權的絕對性宣稱前，在持續的緊急狀態中，戰後台灣的主權基礎與有效早就令人懷疑。1980年代開始的民主化只不過掀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因此民族、文化、國家這些概念全都成為攤在檯面上的問題，尤其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正遭遇內外的嚴重危機。有些學者認為1990年代的國家打造不過是延遲的本土民族主義，試著趕上戰後新興國家獨立的浪潮(Makeham and Hsiau 2005: 271)。不過時間的延遲，卻也將這個民族主義政治帶入一個本土/民族/國家概念全都已不一樣的巨變年代。本書第一章將使用Gramsci分析義大利復興(Risorgimento)時代的「被動革命」概念，來看待後解嚴的社會轉變，以了解不同的政治與社會力量如何爭奪領導權，卻無法完成全面性的霸權的過程。「被動革命」概念點出一個特殊時空下的各方力量競逐的(不)平衡作用，我認為對分析台灣的民主化有具體的幫助。

第一章分析的人民主權以及新的憲政秩序的成形，在1990年代的台灣，立刻遭遇挑戰。除了國家認同的持續爭議外，另外則是來自新的社會力量的嗆聲。第二章分析的是起自1980年代末期的許多新成立的社會運動團體，從1990年代後半開始，這些團體及其網絡，已變成市民社會很重要的組織性力量。行動劇碼、組織策略、動員結構、政治操作都比先前預期的變得更加複雜精緻，愈來愈多的人牽扯進來，運動也愈來愈整合。第二章因此檢視這些社會力量如何成形、組織與整

合，我會分析抗議現場、組織瑣事以及願景想像等等，深入探究這個社會運動世界。

第三章則將探討通常被我稱為「大聲公眾」的形成史，構成本篇的第三個主題。民主為公民權和社會生活注入新元素，這些新元素也將民主轉變成為一個無法抗拒而引人入勝的生活方式，產生的吸引力甚至常引起極端的情感爆發。我將在這一章檢視這個政治表達與溝通的新現象如何重定義市民社會，這個政治熱情所形成的新場域——不管是在電視螢幕前、客廳或咖啡廳空間裡——也成為社會與政治、地方與全球不同力量交會的界線地帶。

本書的第二部分檢視台灣的「本土」問題。第四章分析本土的一段智識發展史，第五章分析「本土」概念所帶來的認同政治。認同問題在台灣具有爆炸性，雖然很多批評者視「本土」政治已成為過去二十年的一個新國家意識型態的根基，因此遭剝奪了許多原有的批判與實驗內涵。但是我仍然認為本土認同，基本上是將個人和文化重新連結的過程，過程中無法避免得面對階級、環境、性別等等分別所帶來的分隔問題。本土認同政治讓我們得從自我認知裡來轉化這個差異政治，並產生行動的動力。第四章追溯本土概念的系譜，第五章檢視本土概念在社會運動動員與福利國家政治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本土政治迫使個人追問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到底要變成甚麼樣的狀態。尤其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無情年代裡，這些追問牽涉道德的政治和經濟學。

第六章探究認同政治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一個新的少數政治，族群成為多元文化表現的根源，而民主則提供了另類文化想像的舞台。此章將探討台灣社會裡的兩個有關族群承認政治的案例：其中之一是有關邦再人的部落主義實踐，重新挖掘了一段被湮滅的過去。另外則是常被稱為客家基進主義的文化復振，顯現台灣漢族認同的異質性。

第三部分以三章的篇幅探討民主的地方性問題，包括社區動員、地方政治與性別想像，並以台北市一個地方鄰里研究為例。第七章首先檢視台灣的地方動員，探討「社區」這個概念，及其對民主深化的影

響；第八章探討都市鄰里地方政治，探討地方性的爭議，強調爭議必須放在一個追尋社區意義的脈絡來看；第九章檢視台北市鄰里的媽媽網絡，探討一個新的女性組合，以及因此形成的「集體母性」的問題。這個三部曲分析將帶領我們探討都市社區的複雜與多重面向，以了解民主的空間意義與地方效應。

本書結論回到台灣無可避面的一個全民關懷，亦即台海的戰爭與和平和民主的交互影響。自從馬英九在2008年成為總統後，維持一個自由貿易架構下的和平情勢成為他的兩岸政策核心，不過也帶來激烈的公共辯論。我會將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想像問題化，放在一個新中國主權形成的脈絡來看。在這個論述、軍事與經濟超級霸權的形成過程中，台灣內部政治成為新的戰線，而民主則成為最後一道防線，以及唯一的希望。

人類學的任務

回到研究台灣民主的初始，記得1998年的春節假期，我在台大附近的爵士樂酒吧跟當時的勞工陣線總幹事郭國文進行訪談。郭國文談到希望能將他的參與社運的經驗寫作出書，問我是否可以幫忙。我很樂易地接受，並透過幾次的深度訪談幫忙整理他的記憶與思緒。這些訪談不只勾起了他的回憶，也使得我陷入何為人類學任務的長考。身為研究台灣社會的人類學工作者，傳統民族誌研究裡到達與離開的尋常戲碼並不適合我的狀況，田野絕非等待填充的空白紙頁。身為台灣人兼行動研究者，我一方面有在家的熟悉感，一方面卻也時時感到因迷惘帶來的焦躁。

郭國文的訪談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當時的思索卻一直讓我不敢忘記人類學家的角色與責任問題。我記得為甚麼我要從機械系的大學畢業生，轉換軌道選擇人類學作為志業，人類學作為社會分析的有力工具，對當時自詡為社會改革學生的我，具有無比的吸引力。本書將這

些二十多年來以行動見證歷史的許多人的關懷、激動與挫折寫出，寫作過程無時不在提醒我不要忘記人類學和本書主題——社會運動——無法切開的關係。

本書嘗試解決書寫台灣民主和社會運動常遇到的問題，希望這些理論思索可以幫助了解台灣社會——對我來說，既是家也是田野，而研究成果也能成為進一步行動投入的憑藉。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資料